

钓鱼的快乐,古人远比你懂



商代白玉鱼形佩 故宫博物院藏 (资料图片)



战国时期鱼形壶 故宫博物院藏 (资料图片)



明代陆治《寒江钓艇图》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(资料图片)

凡鱼不敢朝天子,万岁君王只钓龙。”

到了北宋,赏花钓鱼宴逐渐成为定例,参与的人员、流程都有了规定,大臣们也以参加赏花钓鱼宴为荣。欧阳修诗中写道:“侍上幸后苑,赏花华景亭,钓鱼涵曦亭,遂宴太清楼”。先陪皇帝在后院赏花,然后去钓鱼,最后去楼里吃饭,流程安排的明明白白。

传言在赏花钓鱼宴上,臣子必须等到皇上钓上鱼才能举竿,之前即使鱼咬钩了也不能动弹,那要是皇帝一直钓不上鱼呢,宋真宗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,想想李家明的故事,臣子要说什么就很清楚了吧,丁谓当时言“莺惊凤辇穿花去,鱼畏龙颜上钓迟”,拍马屁的套路一如既往。

偶尔有大佬不按套路出

牌,那就是王安石。在宋代《邵氏闻见前录》中写了这么一件事,王安石把钓鱼的鱼饵吃了,而且还吃了不止一粒。这是吃第一口没尝出来?还是鱼饵太好吃了?太好奇皇帝鱼饵的制作原料了。

也有臣子在钓鱼这件事上借题发挥的。这里就是指“龙阳之好”的龙阳君了。《战国策》里记载,魏王和龙阳君同船而钓,龙阳君钓了十几条鱼之后就哭了,魏王就问:“你是有什么不称心的事情?为什么不告诉我呢?”

龙阳君回答道:“我没有有什么不称心的事,是在为这些之前钓的鱼流泪。最开始钓到鱼我就很开心,可后来得到更大的鱼,就只想把之前的鱼扔掉。我这样丑陋的人能够得到大王的宠幸获得爵位,天下那

么多的人知道了一定会奔向大王,到时候我就会像之前的鱼一样被抛弃了,我怎么能不流泪呢。”魏王立马回答:“你错了!你有这样的想法,为什么不告诉我呢。”随后就下令全国禁止谈论美人,否则就会被灭族。

从古到今,人们对钓鱼的痴迷就没有停止。问历史上谁最喜欢钓鱼?会有无数的答案。只是某些文章总是将喜好将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人列入钓鱼的十大名人十大高手之类,原因多在于他们有名气且有写过关于钓鱼的诗篇。这着实令人不能认同。要说真正的钓鱼人,还得看下面这几位古人。

张志和,唐代人,“西塞山前白鹭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。”这是他的诗句,自称烟波钓徒,每次垂钓都不设鱼饵,志

趣不在鱼之上。独来独往的钓鱼很是快乐,以至于兄长担心他一去不返而给他建了栋房子安家。陆羽问他:“你都经常和谁往来”,他回答:“我以天地当房子,明月当蜡烛,和四海的朋友都在一起,都没有离开过,为什么有往来呢。”

王宏之,南朝宋人,拒绝了朝廷的征召,喜欢在上虞江钓鱼,路过的人问他:“渔夫钓的鱼卖不卖?”他回答:“我钓不到鱼,钓到了也不卖。”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就装好鱼回城,路过亲朋好友家都会放一两条鱼在门口。大概是最受亲朋好友喜欢的隐士了。

冠先,《搜神记》里的宋国钓鱼人,一百多年就在睢水旁边钓鱼、吃鱼、卖鱼,与世无争,还喜欢种荔枝,吃花和果实。这样的惬意悠闲的生活被宋景公终结了,“宋景公问其故,不告,即杀之”。

细想起来,古人说不定比现代人更会钓鱼。宋代学者邵雍《渔樵问答》中写到:“六物者,竿也,纶也,浮也,沉也,钩也,饵也。一不具而鱼不可得。”其中提到了渔杆、鱼线、鱼漂、鱼坠、鱼钩、鱼饵,可见古人的钓鱼工具已经和现代差不多了。

如果把格局放大,钓鱼的“鱼”可以是什么呢?在《长短经》里有专门写到如何以君主好恶为鱼饵,来获得君主最后对自己言行的支持。在《史记》里,司马迁写吕不韦“欲以钓奇”,因此把赵姬送给子楚,以钓取最终拥立一国君主的功勋。

木小烁(摘自澎湃新闻)

诗无达诂。湖南长沙窑兴起于唐安史之际,作为民窑罕见于文献,在当时却繁盛一时,印尼海域“黑石号”沉船上发现的5万多件长沙窑的外销瓷器,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唐代诗人李群玉(808-862)留下《石渚》(石渚即现在的长沙丁字镇,是长沙窑烧制的核心区域)一诗,描写长沙窑的繁荣景象:“古岸陶为器,高林尽一焚。焰红湘浦口,烟浊洞庭云。迥野煤飞乱,遥空爆响闻。地形穿凿势,恐到祝融坟。”

周世荣在《长沙窑彩瓷》说:“长沙窑以烧彩瓷为主,同时也兼烧青瓷和少量的白瓷。但青瓷比不上越窑青瓷之坚细,而白瓷也敌不过邢窑白瓷之雪白。长沙窑瓷器不以胎质取胜,也不以追求如霜似雪的釉质取胜,而是以彩色灿烂,繁花似锦的釉下彩绘装饰取胜。”在釉下彩(现在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是釉上彩)装饰当中,有一首写于壶上的“君生我未生,我生君以(已)老,君恨我生迟,我恨君生早”颇为引人注目,通常将此诗解释为一首情诗,充满哀婉与惆怅。

长沙窑瓷器器身上的唐诗有一百多首,其中仅十首见于《全唐诗》,一般认为这些诗歌出自底层文人或者工匠之手,通俗易懂,如:“男儿大丈夫,何用本乡居。明月家家有,黄金何处无。”“一日三场战,曾

唐人无惧相忘江湖

“君生我未生”无关爱情

露出唐代西域孩童的教育细节,反映了中原文化在西部地区得到广泛传播。如果我们检阅长沙窑的题诗,会发现有一首与卜天寿的打油诗诗意相同的诗:“竹林青郁郁,鸿雁北向飞。今日是假日,早放学郎归。”

“早放学生归”的心理,真是古今一体,中外咸同。作为一种“共情”,很适合作为面向市场的商品。

赵文润在《隋唐文化史》里认为,唐代的乡村学校主要靠束脩和个人资助,所以受政局变化的影响不大,即使安史之乱以后,也没能摧毁乡学系统。这些论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,为什么远隔万里的新疆吐鲁番和湖南长沙窑会出现内容相近的题诗,这些相似性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唐诗在当时的写法。

空海在《文镜秘府论·南卷》里说:“凡作诗之人,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,名为随身卷子,以防苦思。作文兴若不来,即须看随身卷子,以发兴也。”这说明大多数的唐诗其实从题材到意蕴都是类型化的写作。因此,西川在《唐诗的读法》中说:“纵观《全唐诗》,其中百分之七十的诗都是应酬之

作”。号称“孤篇盖全唐”的《春江花月夜》的作者张若虚,见于《全唐诗》的作品还

有一首名为《代答闺梦还》,看完简直像另一个人所作。

理解了长沙窑是面向市场流通的商品,长沙窑上的一些所谓情诗就有别解。比如,“君弄从君弄,拟弄恐君嗔。空房闲日久,政要解愁人。”“夜浅何须唤,房门先自开。知他人睡着,奴自禁声来。”“春水春池满,春时春草生。春人饮春酒,春鸟弄春声。”……

以上所述均非私情。这类艳情诗写的是冶游的放纵,这类商品所使用的场合,也是公共场所而非私宅。王重民《敦煌曲子词集·叙录》中说“唐末中原鼎沸,生灵涂炭,而词曲一科,反成熟于此时期。盖当时人民颠沛流离者多,益以寄其愁苦生活于文酒花妓,《花间》《尊前》,已撮其菁英,惜乎此外则摭而不录也。”

那么,“君生我未生,我生君以(已)老,君恨我生迟,我恨君生早”该做何解呢?

郭预衡《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隋唐五代卷》中说,唐人阅历丰富,“与局束于半壁江山的南北朝文人相比,唐朝文人由于国家的统一强盛,所以气度恢弘,阅历丰富,他们大多注重事功”。所以,别离就成为唐人

的常态,他们抒写别情乡恋,多悲欢离合的人生感慨,不作凄切缠绵的儿女之姿。

比如,“下马饮君酒,问君何所之?君言不得意,归卧南山陲,但去莫复问,白云无尽时。”(王维《送别》);再比如,“走马西来欲到天,辞家见月两回圆。今夜不知何处宿,平沙万里绝人烟。”(岑参《碛中作》)。

唐人的分别实在是太寻常了,“君生我未生”的故事也俯拾皆是。李群玉曾经得到宰相裴休(791-864)的荐举,两人相差17岁;天宝三载(744),李白被赐金放还,先后在洛阳、兖州等地与杜甫游,前后两年的时间里“醉眠秋共被,携手日同行”,两人相差11岁。

而写出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贺知章与李白等合谓“饮中八仙”,李白不止一次为贺知章写诗,如《送贺宾客归越》,“镜湖流水漾清波,狂客归舟逸兴多。山阴道士如相见,应写黄庭换白鹅”,两人相差41岁。

朋友之间太需要友情的慰藉,他们相逢于道中,相别于驿站,相交于冬雪,相忘于江湖。

杭侃(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)

